

国外如何治理网络谣言

网络谣言，混淆视听，目前已成为世界一大公害。面对此痼疾，各国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破解这道难题？

西方有位学者曾断言：“有了互联网，世界是平的。”因为互联网把我们所有人都紧紧绑定在一起，深刻影响着每一个人。然而，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它在带给人们更多便利的同时，也加剧了网络谣言的传播。网络谣言不仅诋毁、败坏个人名誉，更会损害国家形象，影响和破坏社会稳定。如今，网络谣言已成为全球共同面临的社会问题，各国依据本国国情，探索出了不同的解决方式。

西班牙培训“抵制谣言代理人”

西班牙巴塞罗那市政府专门设立了“抵制谣言代理人”岗位，招募和培训工作人员，专门从事破除谣言和向社区邻里传播真相的工作。例如，有人在网络上抱怨“当前享受公寓补助的都是外国移民，没有西班牙人”时，“抵制谣言代理人”迅速回复加以澄清：“今天收到公寓补助的人中，外国移民比例仅占二十分之一。”

日本发布防止谣言传播的指令

日本是注重行业协会组织的国家，各企业都要加入到行业所在的协会之中，并听从行业协会的指令。这些行业协会大都归总务省管辖。2011年3月11日东日本大地震发生后，有关地震及福岛核事故的各种谣言在网络上迅速流传，给国民造成极大恐慌。日本总务省发布通知，要求“电气通信事业者相关团体”所管辖的电气通信事业者在保证报道的同时，采取为大众所知的必要措施，以消除谣言的危害。

法国成立辟谣网站驳斥谣言

法国一些热心网民和记者自发成立了名为“停止传谣”的辟谣网站。该网站的主页上写着：“本网旨在利用网络提供真实信息，替代那些虚假信息。请速将您认为是谣言的信息告知我们，如果核实验为谣传，本网即会刊登辟谣。”2011年9月30日，法国各地有大批的中学生冲上街头，抗议教育部门取消一个月的假期。“停止传谣网站”经向法国教育部门核实后得知此消息不实，立刻在网站上辟谣，申明假期不会取消，稳定了那些中学生的神经。

“失孤”面前，科技还可以做些什么

雷泽宽骑着旧摩托车奔驰在绵延的乡间公路上，插在车尾的大旗迎风展开。经过旅途的风吹雨打，旗已不新了，但上面印着的男孩的笑脸，仍崭新如初。

这是电影《失孤》中，刘德华饰演的农民雷泽宽奔波寻子时的常态。随着电影上映，“儿童拐卖”这个刺痛中国社会的问题又引起了新一轮的讨论。

“失孤”面前，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技术正赋予人们越来越多的手段。

电影中，老雷的儿子是1997年失踪的。而在银幕外，于1996年失踪的“安珀·海格曼”是美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失踪儿童。正是他催生了美国失踪儿童报警系统：琥珀警戒(Amber Alert)。

它像守护孩子一般，紧紧跟着媒体发展的脚步，一步也不曾落下。最初，它通过电视、广播、手机、电子邮件、路边电子告示牌等多种渠道向全美发布失踪儿童信息。

而在互联网普及后，它登上社交网络，钻进电子地图。如今，用户只要到其Facebook页面完成注册，就可接收警报信息，并分享给好友。

如果你使用谷歌地图产品搜索的地名，恰好在儿童失踪事发地的一定范围内，地图就会马上反应，并列出失踪儿童的姓名、年龄、性别、失踪的具体地点和时间等信息。进一步点击后，你还能了解失踪儿童的着装、疑似信息和疑犯车辆信息等。

此外，谷歌还同加拿大儿童保护中心和欧洲失踪儿童调查机构开展了类似的合作。

《失孤》中，也处处可见互联网的踪影：qq、微博、贴吧论坛……志愿者和失踪儿童的家人利用各类工具互通信息，“线上打拐”。就连文化水平不高的老雷，也学会了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敲击键盘，与网友共同寻子。

电影中有一个平凡却令人动容的情节：老雷和旅途中相遇的青年一起逛夜市，一回身年轻人就没影了，老雷当时很着急，大喊。

回过神来看这段，老雷的着急没必要。在故事发生的2015年，智能手机和移动网络已普及。针对年幼的

儿童，不少机构还专门设计出防走失的“可穿戴设备”。

这类设备有手环、小挂件、鞋履等多种形式。其原理是通过内置的GPS芯片对穿戴者随时定位。家长可通过与可穿戴设备相配套的手机应用向设备发送命令，随时查找孩子的位置和行动轨迹。

这类可穿戴“小保姆”还有一定的学习能力，能根据孩子的日常活动范围，标识“安全区域”，一旦孩子的活动超出这个范围，设备就会向家长的手机及时发送警报。

除了基本的定位和警报功能，可穿戴设备还能通过录音、照相、摄像进行环境识别，在GPS定位的基础上，更加准确地描摹出孩子所在的环境。

从1999年起，中国启动“全国人口信息联网工程”。但当时工程的主要内容是实现户籍管理的电子化，并不包含指纹、DNA等复杂信息，也不要儿童提前登记。

影片中，长大了的失踪儿童曾帅一直没有身份证，因为他被拐时不存在儿童指纹信息或DNA信息数据库，无法确认其真实身份。

如今，这张覆盖十亿级人口数量的“网”，已经可以通过指纹、DNA技术完成对个人的精确识别、定位和管理。

2012年7月，韩国警察局开始试行指纹等事登记制：在经过监护人同意后，提前登记儿童、痴呆患者等的指纹、头部照片及其他个人信息，以方便快速寻找失踪者。

同年，中国颁布的新修订《居民身份证法》也规定了公民在申领、换领、补领居民身份证时应当登记指纹信息。《失孤》中，曾帅找到亲生父母后办身份证时就有录指纹的环节。

如果曾帅被拐前就有这种“人口联网”技术和系统，那他就不用骑着摩托车到处找“吊桥”了。在拆和建每天发生的中国，血液里的DNA比对建筑的模糊记忆要靠谱得多。

当“人口联网”和其他防止人口失踪的技术与制度发展完善后，但愿《失孤》这类“打拐”题材的电影将不再被定义为“现实社会问题片”，而变成一种回忆往昔的“历史片”。

落马官员忏悔录被列入反腐“任务清单” 官员写悔过书博取同情 常以“我是农民的儿子”开头

近日，中纪委官方网站推出“忏悔录”的全新栏目，刊载官员悔过书，起到“沉重的忏悔、深刻的警醒”作用。这项举措引发社会关注。目前，中纪委已汇编十八大以来被查处严重违纪违法中管干部的忏悔录。今年1月，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工作报告列出了2015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任务清单”，其中包括：被立案审查的党员干部，对照自己理想信念的动摇和违纪违法的事实，写出忏悔录，自悔自新，警示他人。新华社记者对多名落马官员的悔过书进行了梳理和跟踪采访。

我是农民的儿子.....

剖析

从台上光鲜到仓皇落马 官员写悔过书三大心态

记者多方采访了解到，官员写下悔过书，主要集中在纪委双规、反贪侦查、法庭陈述、监狱服刑等时期。尤其是在纪委双规或反贪侦查期间，这些官员在短时间内，面临从台上光鲜到仓皇落马的巨大人生反差，不少人会选择以悔过书的方式系统交代违纪违法问题。

心态一 尘埃落定后的彻底解脱

借助写悔过书，系统回忆和梳理其违法问题和心态，争取交代清楚，尽早解脱。

心态二
心存侥幸企求网开一面

还有一些落马官员心存侥幸，在悔过书内容中避重就轻，企图让组织网开一面，给予宽大处理，避免进入司法程序。一旦被起诉后，这类官员即便写下悔过书，也容易找出各种理由来翻供。

南京江宁区水利局原局长徐亮因受贿问题接受纪委调查时，写下悔过书“情真意切”地反思自己“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只怨自己，只恨自己”。在法庭审理时，却全面翻供，极力否认受贿。经多次开庭和质证，徐亮受贿290多万元，及其妻子与证人串通翻供情况被查明，徐亮被判刑13年。

一位基层纪检干部告诉记者，对于腐败官员的调查和处理，是在掌握大量事实和缜密证据的基础上依法进行的，不可能出现涉案者写下详细的悔过书，就简单给予党纪处分完事的情况。

心态二 排解惶恐争取尽早解脱

一位基层纪委干部介绍，在办案期间，落马官员除了需要接受询问和调查，大量时间处于高度紧张或空虚之中。一些人就会

建议

用好反面教材 警示他人完善制度建设

一些受访的司法业内人士和专家学者介绍，贪腐官员在接受调查或者入狱改造期间，纷纷选择写“悔过书”的重要动因，是在司法实践中，“悔罪”可作为判决时从轻量刑和减刑表扬加分的考虑情节。

全国人大常委会2014年起实施的《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中明确，对于当庭自愿认罪的，根据犯罪的性质、罪行的轻重、认罪程度以及悔罪表现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10%以下。

湖北省法院系统一位法官表示，官员若在双规或者司法调查过程中写“悔过书”，对所犯罪行进行承认和反省，对于最终减轻量刑会起到积极作用。

悔过书的公开警示教育功能作用，在纪检系统也一直备受重视。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工作报告中提出，将被立案审查的党员干部，“对照自己理想信念的动摇和违纪违法的事实，写出忏悔录”，列入2015年的工作任务，且提出要深入剖析十八大以来查处的典型案例，用好用活反面教材，发挥警示、震慑和教育作用。

“用好忏悔录这个反面教材，通过被立案审查的党员干部自悔自新，现身说法，将起到警示他人的作用。”中央纪委研究



(本报资料图片)

梳理

内容基本具备“四要素” 主要分为三大类型

在中纪委网站《忏悔录》栏目中，江苏徐州市政协原副主席张引、辽宁广播电视台原台长史联文二人的忏悔书先后被刊载。回顾个人经历、反思贪腐原因，是这两名厅级干部忏悔的主要内容。

从上世纪末江西省副省长胡长青反省的悔过书，到安徽省副省长倪发科剖析“玉”与“欲”的忏悔陈述，以及湖南株洲一名处级干部对落马文采斐然的反思，形形色色的各类悔过书成为落马官员交代违法问题，表明认罪态度的重要材料。西南政法大学教授陈步雷说，

综合林林总总的官员悔过书来看，交代问题、剖析动机、反省告诫、提出诉求，往往是悔过书、忏悔录内容中常见的“四要素”。由于官员是抱着系统梳理自身问题而写的文字材料，因此，悔过书在锁定违法犯罪证据、反思官员贪腐动机等方面，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记者梳理一批官员悔过书发现，贪官们回顾首次收受他人财物，及至后来发展成违法犯罪的全过程，总结原因主要包括：自身放松政治理论学习、长期不能接受监督、忽视了世界观改造、没有加强廉政修养等。

按照作者的核心心理诉求，悔过书主要分为三种类型：

A 博取同情型 代表人物：王昭耀



安徽省委原副书记王昭耀曾忏悔道“我家祖祖辈辈是农民，我是农民的儿子”；贪污受贿被判死刑的浙江杭州原副市长许迈永在悔过书中称，“我16岁高中毕业后参加农业生产劳动，起早摸黑，蚂蟥蚊子叮咬，劳动一天也只有几角钱”。

据基层纪检干部介绍，不少落马官员在悔过书中将贫困、草根的身份抛出来，把苦难的过去割白给公众看，既有痛定思痛的原因，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博取同情、寻求宽大处理的心理。以至于“我是农民的儿子”，成为不少官员忏悔书高频使用的开头。

B 高调表功型 代表人物：张曙光



一些官员在忏悔书中会着重描述“辉煌业绩”，展示“功臣犯错”的形象。

原铁道部副总工程师张曙光在忏悔书中说道，“我们上百个工厂，几万名工程师，几万名职工干了整整7年，形成了中国自己的高速铁路体系”；史联文也在忏悔书中高调表功，“做了很多前人没有做成的大事”“辽宁广播电视台的改革成为全国同行业的一面旗帜”。

C 告诫建议型 代表人物：倪发科



还有一些官员在悔过书中，主动将自己当反面教材，并结合堕落经历，提出建议告诫后人。倪发科在悔过书时告诫“身边工作过的同志”，“慎独、慎行、慎交，要以我为鉴，不要让我的悲剧在他们身上重演”；史联文则在忏悔录中，从干部使用、与商人打交道、注意圈滑人、对待身边人四个方面，对同类领导提出建议。